

公共基础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的影响因素

——以江西省实证研究为例^{*1}

罗冬林

【摘要】：通过访谈样本和有关 PPP 模式政策文件样本，运用扎根理论对江西省公共基础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进行理论构建和推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影响路径及重要性序次是制度性、主体性和社会性因素，且都呈正影响；合作收益、资本投入、风险承担、合同执行、创新贡献与主体性因素，财政补贴、回报方式、激励制度、运营市场化与制度性因素，民众支付意愿、项目绩效评价、民众支付能力与社会性因素都是正向关系。同时藉以提出加强制度供给、鼓励创新性收益、严格合同执行、完善民众参与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等建议。

【关键词】：扎根理论；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PPP 合作收益分配；启示

【中图分类号】： F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7)05-0176-07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17.05.025

2015 年李克强总理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工作的通知（2015）》^[1]精神，江西省发改委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召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推介项目新闻发布会，2015 年第一批总投资 1065.17 亿元的 80 个项目亮相，涵盖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农业技术转让等领域。因此，为了使得这一模式在江西省顺利得到应用，研究公共基础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基于扎根理论的 PPP 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理论构建

扎根理论研究法^[2]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同时运用了推理、比较、假设检验与理论建立等方法。其基本逻辑路径是采取理论取样从下往上深入情境收集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3]。这种特点由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这三重译码过程所体现出来。

（一）理论取样与编码

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数据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依 Barney Glaser 的观点，“一切皆数据”。它可以“来源于访谈和观察，也可以来源于包括政府文件、录音、新闻报道、信件、著作等任何能为研究问题提供线索的材料。”^[4]江西省公共基础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理论取样源自于国家、江西省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及所作出的访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三重

¹ **基金项目：**2015 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江西省公共基础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ZT38）

作者简介：罗冬林，江西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模型。（江西南昌 330013）

编码,具体过程见表 1-3。

表 1 访谈样本

原始资料(访谈节录)	开放性编码
A1.若我公司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风险比较大,收益分配就要多;若项目不赚钱,政府要补贴的。 A2.我们有专业的技术,能比政府建设节省成本,效率高。 A3.企业具有创新管理能力;这是付出成本的代价换来的,是要参与分配的。 A4.PPP 基础设施项目能给合作企业带来多大的合作利益,这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它相当于企业把这笔资金投入其他项目所能得到收益。 A5.如果我们企业努力会带来创新性收益的话,也会担心地方政府会变更合同内容,造成我们的利益损失。……	A11 风险考虑 A12 国家补贴
	A13 资本投入 A21 节约成本
	A22 效率 A31 管理创新
	A32 创新贡献 A41 合作收益
	A51 创新收益 A52 合同改变
B1.即使社会资本能改善我们的福利,但是对于收费性项目,收费要公平,比如垃圾处理,若收费过高,谁也不愿支付的。 B2.公私合建的南昌地铁收费要考虑市民的承受力,要高收费政府就要补贴。……	B11 公平 B12 支付意愿
	B21 承受力 B22 政府补贴
C1.合作收益分配是 PPP 模式成功的关键。我们会权衡市民、合作企业的利益。 C2.我们担心的是合作企业不按照合同来执行,会隐瞒项目所带来的利润。 C3.在订立合同时考虑投入的累加、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设置激励因子。……	C11 合作收益 C12 市民利益
	C21 合同执行 C31 努力程度
	C32 激励因子 C33 累加投入
D1.这种模式的利益分配,依我看,要从三个方面讲,一要设计好风险承担系数,保证市民、政府、企业的各有所得;二要看企业的创新贡献,设计好激励系数;三要考虑市民的承受能力,项目使用收费该设多大。 D2.PPP 合作利益分配结构要系统地看,风险承担、资金投入、补贴、收费、市民支付意愿等都对分配机制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也相互影响。总之要综合考虑。 D3.PPP 模式合作收益分配维度在于该项目绩效的社会评价,它既反映了社会公正与公平,也反映了该项目的成功与否。……	D11 风险承担系数
	D12 创新贡献 D13 激励系数
	D14 市民支付意愿
	D21 资金投入 D22 补贴
	D23 收费 D24 市民支付意愿
	D31 项目绩效评价
	D32 公正与公平

注:A_{ij}表示江西省企业对象 A 第 i 个的第 j 个概念化;B_{ij}表示公民对象 B 第 i 个的第 j 个概念化;C_{ij}表示政府对象 C 第 i 个的第 j 个概念化;D_{ij}表示专家 D 第 i 个的第 j 个概念化。

表 2 政策文件样本(摘要)

政策文件	原始资料(摘要)	开放性编码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4〕60 号	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 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完善财政补贴制度,切实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鼓励通过 PPP 方式盘活存量资源,变现资金要用于重点领域建设。 对 PPP 项目的业主选择、价格管理、回报方式、服务标准、信息披露、违约处罚、政府接管以及评估论证等进行详细规定,规范合作关系。平衡好社会公众与投资者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又要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 政府和投资者应对 PPP 项目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商业风险、环境风险、法律风险等进行充分论证,完善合同设计,健全纠纷解决和风险防范机制。 项目合作结束后,妥善处理投资回收、资产处理等事宜。	E11 运营市场化
		E12 合作机制
		E13 财政补贴
		E14 盘活存量资源
		E15 合作关系
		E16 利益关系
		E17 风险论证
		E18 合同设计
		E19 投资回收
		E20 社会公众利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	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根据各地实际,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核定价费标准、给予财政补贴、明确排他性约定等,稳定社会资本收益预期。 按照风险收益对等原则,在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 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资源以及社会可承受的原则,加强投资成本和服务成本监测,加快理顺价格水平。加强价格行为监管,又要规范政府价格行为,提高政府定价、调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F11 投资回报机制
		F12 财政补贴
		F13 风险收益对等
		F14 补偿成本
		F15 合理收益
		F16 规范政府价格行为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发改令 财政部令 住建部令 第25号2015-4-25	兼顾经营性和公益性平衡,维护公共利益。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投资回收期等综合因素确定,最长不超过30年。 相关领域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主体建设运营能力状况和参与意愿。 用户付费项目公众支付意愿和能力评估。	G11 经营性和公益性平衡
		G12 投资回收期
		G13 市场主体建设运营能力
		G14 公众支付意愿
		G15 公众支付能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政部 2014-11-29	定性评价重点关注...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 定量评价...计算项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 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每年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等财政支出不得超出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 按照风险分配优化、风险收益对等和风险可控等原则,综合考虑政府风险管理能力、项目回报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等要素,在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 原则上,项目设计、建造、财务和运营维护等商业风险由社会资本承担,法律、政策和最低需求等风险由政府承担,不可抗力等风险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理共担。	H11 优化风险分配
		H12 运营效率
		H13 促进创新
		H14 政府支出成本现值
		H15 政府债务
		H16 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
		H17 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H18 风险分配

注:1.Enm表示文件对象E第n个的第m个概念化;Fnm表示文件对象F第n个的第m个概念化;Gnm表示文件对象G第n个的第m个概念化;Hnm表示文件对象H第n个的第m个概念化。2.南昌市《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上述文件为基础,则所提取的开放性编码类似。

表3 选择性编码结果

主范畴	次范畴	初始概念
主体性因素	合作收益	A21 节约成本 A41 合作收益 A51 创新性收益 C11 合作收益 E12 合作机制 E15 合作关系 E16 利益关系 F15 合理收益 H14 政府支出成本现值 H17 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资本投入比重	A13 资本投入 C33 累加的投入 H16 政府付费.....
	风险分摊系数	A11 风险考虑 E17 风险论证 F13 风险收益对等 H11 优化风险分配 H15 政府债务 H18 风险分配.....
	合同的执行度	A52 合同改变 C21 合同执行 E18 合同设计.....
	创新贡献度	A22 效率 A31 管理创新 A32 创新贡献 C31 努力程度 E14 盘活存量资源 G13 市场主体建设运营能力 H12 运营效率 H13 促进创新.....
制度性因素	财政补贴	A12 国家补贴 B22 政府补贴 E13 财政补贴 F12 财政补贴 F14 补偿成本.....
	回报方式	E19 投资回收 F11 投资回报机制 G12 投资回收期.....
	激励制度	C32 激励因子.....
	运营市场化	E11 运营市场化.....
社会性因素	民众支付意愿	B12 支付意愿 C12 市民利益 F16 规范政府价格行为 G14 公众支付意愿 G11 经营性和公益性平衡.....
	项目绩效评价	B11 公平 D31 项目绩效评价 E20 社会公众利益.....
	民众支付能力	B21 承受力 G15 公众支付能力.....

注:初始概念指开放性编码的结果。

(二) 理论模型构建

通过扎根理论得出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的三个主范畴，分别是主体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以及 12 个次范畴（合作收益、资本投入比重、风险承担系数、合同执行度、创新贡献度、财政补贴、回报方式、激励制度、运营市场化、民众支付意愿项目绩效评价和民众支付能力），从而构建出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的构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合作分配机制影响因素假设的理论推演

（一）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作用

PPP 合作项目总收益量是收益分配的基础。经验表明，PPP 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与是否能满足所有参与方的利益需求密切相关。根据博弈理论和期望理论，由于资本逐利本性，投入的资本越多，其期望收益就越大。而资本投入是 PPP 模式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私合作双方收益的最显著贡献：对于民营部门来说，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否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回报；对于合作地方政府而言，则是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实现预期的公益。

风险管理成功与否是 PPP 项目成败的关键^[5]。一方面，资本投入本身是一种风险；另一方面，不仅有效地控制和管理风险会极大地降低项目成本，从而间接增加项目收益，而且收益分配是对承担风险的一种奖励，即用更多的收益回报来平衡其在承担风险中付出的成本。风险在公私双方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转移，可以提高双方的合作效率，进而增加项目总收益。由此可见，公私合作的前提条件是承担的风险要和获得的收益相匹配。

PPP 模式的运行基础是合同。项目损失会出自于合同安排的设计缺陷，但是由于合同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违背合约，因而合同的执行程度更加损害或增加项目的总收益。Viegas 强调 PPP 合同的收益分摊应将合同期限加以考虑^[6]。并且 PPP 项目的生命力在于合同的执行^[7]。它促进公私合作关系，减小交易成本，提高项目的效率，实现项目收益最大化。因此，合同执行度是影响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而在 PPP 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创新努力可以提高公共资产的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鼓励合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投入最有竞争力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8]，进而影响整个过程的效率来增加合作收益。

于是，作出如下假设：

H1：主体性因素促进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运行。

H1-1：合作收益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1-2：资本投入比重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1-3：风险承担系数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1-4：合同执行度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1-5：创新贡献度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作用

制度的作用在于引导，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有关公共设施 PPP 模式的制度是 PPP 合作收益分配的直接依据。由于公共设施 PPP 模式所存在的风险性，财政补贴是作为一种风险补偿，合作企业必定诉诸于这种制度。如果给予民众以公平的参与，他

们有类似的利益诉求。激励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尽力发挥合作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公共资源的增值功能，但其约束条件是地方政府债务。而运营市场化是用来规范合作企业的收益率，用收益率上限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

从本质上讲，回报方式本身就是从制度上对合作收益预设分配机制。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核定价费标准、给予财政补贴、明确排他性约定等方式，来稳定社会资本收益预期。

于是，又作如下假设：

H2：制度性因素对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起促进影响作用。

H2-1：财政补贴与制度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2-2：回报方式与制度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2-3：激励制度与制度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2-4：运营市场化与制度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三）社会性因素

民众是 PPP 项目的项目使用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项目收费减少就是他们收益的增加。一则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来影响项目的收费。二则从依据心理账户来讲，他们对项目有一个心理定价，如果实际定价过高，超过他们因工资收入低的支付能力，他们就会选择替代性项目或者要求政府补贴来影响 PPP 项目的收益。因此，合作收益分配要考虑民众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同时，民众又是项目绩效的评判者，比如对于城市环境修复，他们能从真实的感受中作出评价。从而有必要在公正和公平的基础上设计分配机制。

于是，再有如下假设：

H3：社会性因素对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起促进影响作用。

H3-1：民众支付意愿与社会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3-2：项目绩效评价与社会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H3-3：民众支付能力与社会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得到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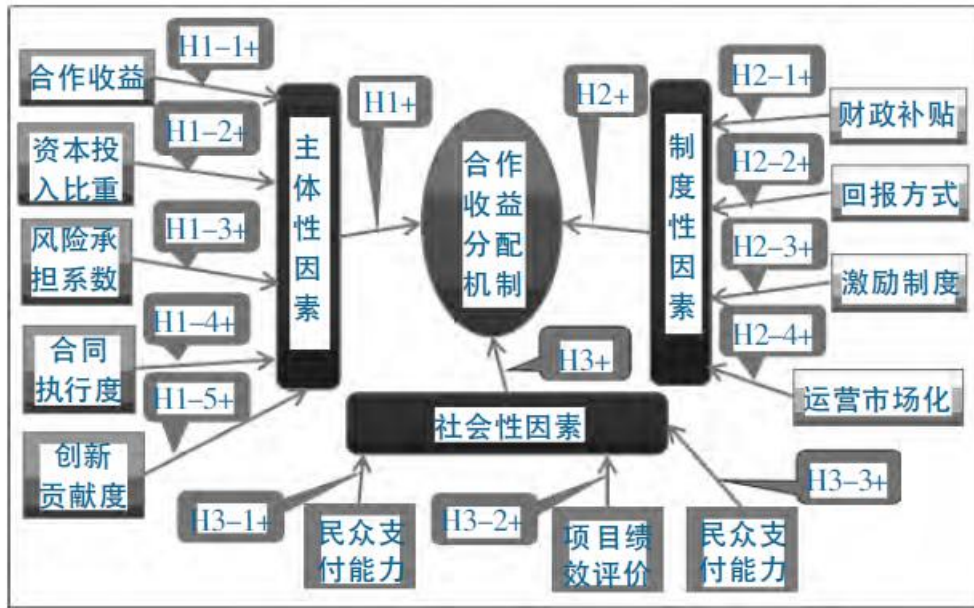


图 1 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运用扎根理论对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影响因素的理论构念，在预调的基础上对江西省部分地市的大学、政府、企业及市民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称和职务等方面进行了分层式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20 份，回收问卷 434 份，问卷回收率 83.5%；去除数据缺填和选答雷同的问卷 30 份，最终有效问卷 404 份。运用 SPSS19.0 把 404 个个案随机分成两个样本，样本 A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 B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 SPSS19.0 软件对样本 A 进行 KMO 与 Bartlett 检验，KMO 度量标=0.806>0.8，表明变量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很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三个公因子，即主体性因素由合作收益、资本投入比重、风险承担系数、合同执行度、创新贡献度构成，制度性因素由财政补贴、回报方式、激励制度、运营市场化构成，社会性因素由民众支付意愿、项目绩效评价和民众支付能力构成。由此可知，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提炼的上述影响因素构念得到初步验证。

(二)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目标皆在解释观察变量间的相关或共变关系，侧重于检验假定的观察变量与假定的潜在变量间的关系^[9]。模型矩阵方程式为：

$$X = \Lambda_X \xi + \varepsilon \quad (1)$$

$$Y = \Lambda_Y \eta + r \quad (2)$$

根据前文探索性因子分析，设定内衍观察变量合作收益分配机制为 Y ，主体性因素为 Y_1 ，制度性因素为 Y_2 ，社会性因素为 Y_3 ；外衍观察变量合同执行度为 X_1 ，资本投入比重为 X_2 ，风险承担系数为 X_3 ，合作收益为 X_4 ，创新贡献度为 X_5 ，激励制度为 X_6 ，财政补贴为 X_7 ，运营市场化为 X_8 ，回报方式为 X_9 ，民众支付能力为 X_{10} ，民众支付意愿为 X_{11} 和项目绩效评价为 X_{12} ， Λ_x 是外衍观察变量 X 在外衍潜在变量 ξ 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Λ_y 是内衍观察变量 Y 在内衍潜在变量 η 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ε 、 r 是测量误差。由此得到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数字 0.58、0.60 等是误差方差，0.77、0.76、0.79 等是因素负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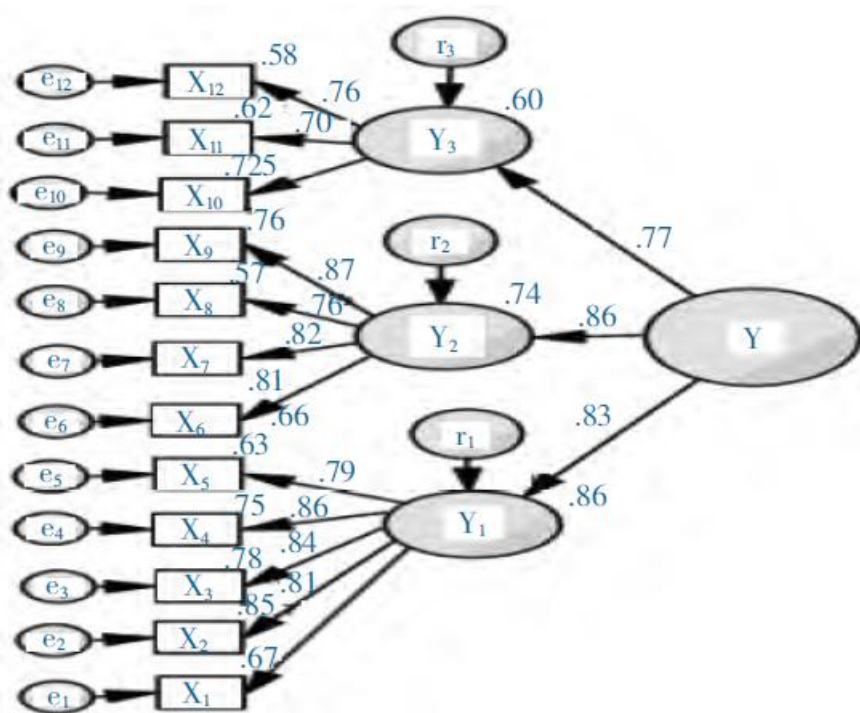


图 2 标准化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

1. 检查样本要求与方法选取。学者 Vlicer & Fava 发现，在 SEM 分析模型中，因素负荷量的大小、变量的数目、样本数的多寡等是决定一个良好因素模型的重要变因。为达到模型估计的稳定性，Mueller 认为单纯的 SEM 分析，其样本大小标准至少在 100 以上，200 以上更佳，如果从模型观察变量数来分析样本人数，则样本数与观察变量的比例至少为 10:1 至 15:1。样本 B 达到这种要求。但是，利用 Amos20 软件检验显示，多变量峰度系数的 CR 值为 2.607 > 1.96，表示在单变量的峰度系数数值检验中至少有一个变量的峰度系数显著不等于零。因此，根据吴明隆的观点，ULS 方法在数据不需要符合正态分布的假定条件下，也能获得稳定的估计结果。本研究则采用 ULS 方法。

2. 组合信度和效度检验。由于用 ULS 估计方法没有参数效度检验，本研究根据 Fornell 和 Larcker 提出的组合信度以及平均变异量抽取值来判定影响因素的构思信度与收敛效度。CR 判断标准值采用 Fornell 和 Larcker 推荐的 CR 值大于等于 0.70；AVE 值大于等于 0.50。根据组合信度和效度公式（3、4），对样本 B 进行组合信度和效度检验。

$$\rho_t = \frac{(\sum \lambda)^2}{(\sum \lambda)^2 + \sum (\theta)} \quad (3)$$

$$\rho_w = \frac{\sum \lambda^2}{\sum \lambda^2 + \sum (\theta)} \quad (4)$$

其中， ρ 为组合信度， λ 为指标变量在潜在变量上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因素负荷量）， θ 为观察变量的误差变异量（ ε 的变异量），其值=1-因素负荷量平方（信度系数）。

根据计算可得，测量指标 X1-X5、X6-X9、X10-X12 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变异量 AVE 分别是 0.9067 和 0.6606、0.8865 和 0.6620、0.8426 和 0.6414。这表明，样本符合要求，模型内在质量理想。

3. 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由 SEM 模型非标准化估计结果可知，各模型中的误差方差（ $e_1=0.36$ ， $e_2=0.29$ ， $e_3=0.33$ ， $e_4=0.25$ ， $e_5=0.32$ ， $e_6=0.31$ ， $e_7=0.26$ ， $e_8=0.36$ ， $e_9=0.16$ ， $e_{10}=0.21$ ， $e_{11}=0.30$ ， $e_{12}=0.28$ ， $r_1=0.15$ ， $r_2=0.15$ ， $r_3=0.22$ ）都大于 0，各测量变量间的因素负荷量（标准化系数）都在 0.50 与 0.95 之间，符合 Bagozzi 和 Yi 提出的标准（估计参数中不能有负的误差方差；潜在变量与其测量指标间的因素负荷量最好介于 0.50 至 0.95 之间；不能有太大的标准误）。

4.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根据标准化验证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检验结果的绝对适配度指数 RMR（0.023）、GFI（0.997）、AGFI（0.996）、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0.997）、RFI（0.996）、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0.652）、PNFI（0.77）都通过了适配度检验^[13]，说明模型与数据契合好，模型适配度良好，模型解释力和说服力强。从而可以根据 AMOS 得到表 4，前文所做的所有假设推演都得到验证，即相应变量间都呈正相关性。另外，直接效用或间接效用反映的是潜变量与潜变量或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直接效用值就是因素负荷量数值，间接效用值等于相应路径上的直接效用数值乘积。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是由变量转化为标准分（Z 分数）后计算出来的估计值，从因素负荷量的数值可以了解测量变量在各潜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表 4 标准化估计的变量间直接效用与间接效用

	收益分配 机制 Y	主体性 因素 Y1	制度性 因素 Y2	社会性 因素 Y3
主体性因素 Y1	.828	—	—	—
制度性因素 Y2	.863	—	—	—
社会性因素 Y3	.774	—	—	—
合同执行度 X1	.628	.758	—	—
民众支付能力 X10	.657	—	—	.849
创新贡献度 X5	.655	.791	—	—
合作收益 X4	.716	.865	—	—
风险承担系数 X3	.694	.838	—	—
资本投入比重 X2	.667	.806	—	—
回报方式 X9	.753	—	.873	—
运营市场化 X8	.650	—	.753	—
财政补贴 X7	.703	—	.815	—
激励制度 X6	.700	—	.812	—
项目绩效评价 X12	.589	—	—	.761
民众支付意愿 X11	.609	—	—	.787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调研、访谈和文件查阅，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使得由扎根理论提炼出的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的影响因素（合同执行度、资本投入比重、风险承担系数、合作收益、创新贡献度、激励制度、财政补贴、运营市场化、回报方式、民众支付能力、民众支付意愿和项目绩效评价）得到初步证实；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使得 15 个假设得以验证，即制度性、主体性和社会性因素对江西省公共基础设施 PPP 合作收益分配都呈正向影响；合作收益、资本投入、风险承担、合同执行、创新贡献与主体性因素呈正相关性；财政补贴、回报方式、激励制度、运营市场化与制度性因素呈正相关性；民众支付意愿、项目绩效评价、民众支付能力与社会性因素呈正相关性。

同时，模型结果表明，在影响江西省公共设施 PPP 模式下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的三条影响路径当中，制度性因素相对较重要（这是符合客观实际，因为当前 PPP 模式是由制度所推动的。加之该模式的风险性，合作企业首先看到的是制度承诺。），主体性因素次之，社会性因素第三，即影响权重高达 0.863、0.828、0.774。其中，各个因素中变量会产生较大的正向间接影响作用。

（二）政策启示

PPP 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关键取决于合作利益的分配。鉴于 PPP 模式在江西省使用属于初期阶段， 为了保持 PPP 合作收益分配机制顺畅运行， 针对影响路径而作出如下建议：

1. 制度供给优先考虑。[10]制度是在解决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冲突中得以产生和发展，旨在降低合作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制度一旦存在便为进一步的行动确定了参数^[11]。因此，要采用渐进式分配制度设计，即在 PPP 项目运行初期，要明确合作合同细则，确定财政扶持的补贴系数，充分发挥制度的引导作用，增强制度的公信力。其次，在项目成熟后期，加大市场化分配比重，放宽运营市场化弹性，最终达到市场与规范有机结合。

2. 坚持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兼顾创新性收益分配与严格合同执行。一个人或者组织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取决于其对产生集体利益所做投入（成本）和集体利益能够给个人或组织带来的效益作出理性分析和选择。这种集体行动的形成在于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激励性分配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合作方在风险考虑下极大化自身的创新努力，进而激发合作企业所有投入的资源价值效应。另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和维护者，要求地方政府把 PPP 项目债务与收益单行列出， 严格按照合作合同以控制地方政府举债，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保持地方政府债务上限，避免公共收益受到隐性流失，实现公益与私益平衡。

3. 坚持效率与公平原则，完善民众参与机制，加强项目绩效评价。政府与企业的 PPP 合作目的是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和有效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公民的福祉。合作价值最优是衡量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标准，即效率指向企业的分配指标，公平兼顾社会效益。因此，一方面以效率标准增进合作企业的合作，充分实现所有投入 PPP 项目资源的价值效应；另一方面，由于 PPP 项目的享用者是公民，要充分体现其终极目标，精心设计民众参与机制，进行 PPP 项目评价。比如，对于付费项目， 公民总是把项目价格与项目绩效加以对比，如果这种项目价格与市民的收入水平不相适应，则会因不公平感而使这种项目运行不畅。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介项目[EB/OL].

http://xwzx.ndrc.gov.cn/xwfb/201505/t20150525_693169.html, 2015-05-25.

[2] Hammersley M. .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M]. Newbury Park: Sage, 1990:161-184.

[3] 罗冬林. 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合作网络治理机制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5.

[4] Barney G, Anselm 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ine, 1967.

[5] Patrick T I Lam. . A sectoral review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9, 17(2): 77-87.

[6] Viegas J M.. Questioning the need for full amortization in PPP contracts fo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J].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2010(30): 139-144.

[7] 孙桂祥, 杜静.PPP 模式下项目回报影响因素探讨[J]. 项目管理技术, 2009, (9).

[8] 马小峰. PPP 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分配模型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9]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0] 白璐璠, 王春成. PPP 模式与地方公共财政负债管理[J]. 中国财政, 2014, (14).

[11] 卢现祥, 朱巧玲.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